

釣園著作選輯

趙櫟初題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徐 詰

約園著作選輯

張壽鏞 著

張芝聯 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印刷廠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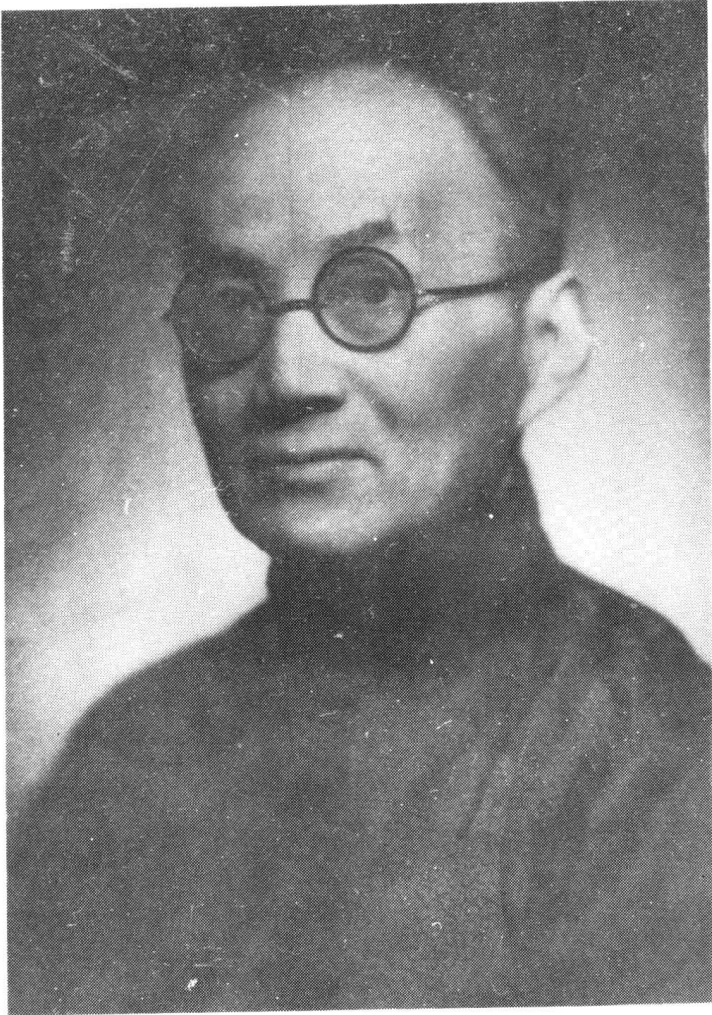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1/32·17¹/₄印張·303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冊 定價 38.00 元

ISBN 7-101-01411-9/K·620

蘇子如夢
PDG



六十二翁甘驥伏一千八輩已龍驤

光華畢業者丙子
級止已得一千八

雨餘竹里新生筍天際

雲孫又織裳往日談經慚汾水今

朝鳴笛在山陽安危事業誰肩任

欣喜吾門有杜房

錄贈別丁丑光華畢業
同學七律一首

炳煌賢弟屬兄張壽鏞題





森既竣工遂自銘曰
乾父坤母賦裁形神
賦二隨地大患育身
宮爲寓爲沒於榮塵
寒暑往來陰陽屈伸
天道如此人事何嘆
斲於太虛曰了緣因
退藏於密返樸歸真
天地一瞬萬古常新

共和紀元九年五月

荀園主人題

心
三

新
天

前言

我的父親張壽鏞（一八七六一一九四五），字詠霓，別號約園，浙江鄞縣人。生前除編刊《四明叢書》七集一千卷外，還撰寫多種著作。按其出版先後，有《皇朝掌故彙編》（一九〇二年，與人合編，自寫外交部分）；《理財牘稿》（一九一八年，魏頌唐輯）；《約園雜著》（一九三五年）；《遊蜀草》（一九三八年）；《約園雜著續編》（一九四〇年）；《約園演講集》（一九四一年）；《詩史初稿》（一九四二年）；《諸子大綱》（一九四四年）；《史學大綱》（一九四五年）；《約園雜著三編》（一九四五年）。

這些著作以前都是私人印刷的，印數不多，流傳不廣，大部分是贈送各大圖書館、親友、學者、同好及光華大學校友。一九六六年臺灣中華大典編印會曾用珂羅版影印《四明叢書》一至六集，有鄞縣張曉峰（其昀）作序。一九八一年揚州市古籍書店發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據原木雕版重印《四明叢書》一至八集，共六三六冊。近聞香港某書店也曾重印《四明叢書》，但未見到。

至於其他著作，除我的六姐漱芬曾在美國複印《諸子大綱》、《約園演講集》等贈送一

些圖書館外，未聞曾加重印。一九八五年適值光華大學建校六十周年校慶、父親逝世四十周年紀念，光華校友會曾編刊《約園詩文選輯》一冊（非賣品），內容祇包括與光華有關的詩文。

明年（一九九五年）是光華大學建校七十周年，父親逝世五十周年，我們決定編印這部《約園著作選輯》，從卷帙浩繁的詩文中選刊約二十萬字的代表作，以廣流傳，並資紀念。寧波同好及光華校友聞訊後，表示熱烈支持，紛紛寄來珍貴資料及紀念文章。香港董氏（原籍寧波舟山）基金會慨允贊助出版；雙親的摯友趙樸初居士欣然為本書題字。中華書局總經理鄧經元，以及總編室、出版部的同志不僅慨然接受書稿，保證剋期出版，而且在編輯與排印等方面大力予以指導與支持。對各方人士的热情關懷和幫助，特別是對董建華先生，我們謹表示由衷的謝忱。

芝聯才疏學淺，對父親的全部著作未能深入研讀，深感慚疚。要在數百萬字的著述中，選出其菁華十之一、二，更非力所能逮，謬誤在所不免，仍冀方家指教。

父親自稱：「生平一溺於詞章，再溺於簡牘，三溺於誇多鬪靡」，「固不敢居學者之名，而又無文人之實。」他又說：「求吾於于詞之中，則詞未修；繩吾文於法之內，則法未守；獨於理之所在，則不敢輕易掉焉。」（均見《約園雜著續編》自序）不論父親如何自謙，

他在舊學術傳統中不僅是文人、學者，而且是通才，對經學、史學、哲學、文學無不涉獵。這樣的通識是舊時代的產物，如今已經不可多得了。但我認為父親真正可貴之處並不在於學識之淵博（晚年他決心由博返約，故別號「約園」），而在於他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在為人處世的大是大非上堅貞不移，言行一致，即他自己所謂「獨於理之所在，則不敢輕易掉焉」。這種精神越到晚年（特別是辭官之後）越鮮明。無論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都表現得異常突出。

我們根據這條主綫，選編了父親的著作，共分七個部分：

一、儒學

這裏選入的幾篇文章，主要是說明父親事功與言論的思想基礎，也是他安身立命之道。父親堅守傳統的儒學陣地，這是毫無疑議的，是時代與教育使然的。在儒家各派中，他最服膺陽明學說，在《王學發揮》中論之最詳。他特別要辨明：王陽明強調良知、心理、真性、誠意等，決非祇講修身養性，而拋開格物、事功。相反，陽明學說既反對「空洞洞離開詩書、拋卻事物」去求良知，也反對「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以致失去頭腦而不自知。陽明主張在抓住大本大原的基礎上，做到知行合一，而不要本末倒置，捨本逐末。父親一生立志為君子，不為小人，得益於象山、陽明之教甚多。他在《立志篇》最

後說：「人之立志，等於立命，命不可忽，而志可忽乎哉？」（《王學發揮》）這是一針見血的話。

元儒劉靜修（因）叙學篇是論治經、史、子、文章、字畫方法的著作。父親寫了《書後》，闡發已見。他總結說：「諸子百家皆有益於振頹起敝，而折衷於孔子」。他又說：「研究過去之言論必當適應今日之需要與挽救未來之狂流，乃為有益。」這表明他很注重學問的實踐。

父親晚年為光華同學講諸子學說，認為各家都「足以補儒家之不足」，「雖小說家亦可取也」。然而他仍堅持一個客觀標準：「欲辨諸子百家之說，亦睹其心之公與私，為一時與為萬世而已，而其要則在取所見，祛所蔽……意有兼明，志在救世，政教合一，道得而幾。」（《諸子大綱》自序）

在這部分我們還收入《定川言行彙考》，不僅表明父親對這位「中流砥柱」的四明宋儒沈煥的高風亮節無限欽佩，也反映其考訂史實一絲不苟的細緻功夫，所謂「學兼宋漢」是也。

二、鄉獻

父親在《讀劉靜修叙學書後》中，引用劉因的話說：「成可以為君相，可以為將帥，時

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立言。」父親二十八歲入仕途，五十歲晉至部級次長，官運不可謂不達。然其實志不在此，五年後辭去官職，一心要辦好光華大學，編輯《四明叢書》。所以他說：「辛未以後盡辭職守，於時專心一力，今人與居者在光華大學；古人與稽者在四明叢書。」（《四明叢書》第六集後序）這就是父親立德、立功、立言的大志。

對父親來說，愛國、愛鄉、愛民、愛青年，是四位一體、不可分割的。愛鄉、愛民、愛青年都是為愛國服務；刊刻鄉獻、培育後生都是救國濟民之道。

四明自古出人材，出大儒，氣節之士尤多。父親自民國初年即開始搜集四明文獻，二十年後方着手編輯。其編輯宗旨，馮孟顥先生歸納為：「先品其人，後平其學，審其所作確乎可傳，方為付刻。故其所列，粹然出於一正，刊落奸佞，表章忠義，實有裨於世道人心，不獨保存鄉邦遺書也。」（《記編輯四明叢書見聞》）日本學者山内正博在一篇論文中把《四明叢書》看作「反對帝國主義暴行和偽善的精神支柱」，「在驚濤駭浪面前，張壽鏞對人民、對祖國的未來懷有不可動搖的信心。」（《張壽鏞的思想》）父親在編完叢書第七集，也是他親手定稿的最後一集之後（一九四〇年）作序曰：「獨居深念，勾踐困吳，會稽奮迹。五胡亂華，典錄斯作。下逮宋明，忠義彪炳。有清十世，君無涼德。中遭喪亂，而吾鄉先達猶得以其學顯，縣迄於今茲。」秦能焚詩書而不能絕老師宿儒相將而傳於天

下後世，然則立德、立功、立言，又可少乎？」（《四明叢書》第七集後序）這可以說是父親對這部巨著的歷史總結。

因篇幅關係，本書祇刊出父親所寫的《四明叢書》各集の後序。他所寫的各書序言（近二百篇）都不曾刊出，讀者可在《四明叢書》各集或《約園雜著》各編中檢閱得到。但第五集《宋元學案補遺》的序跋乃其精心研究的結晶，故全部收入無遺。

三、史學

編輯《四明叢書》需要論世知人，非史學家不能勝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父親本是一位史學家。他自幼愛讀史書，隨讀隨寫札記，名之曰「識略」。他說，「史何以必讀之？蓋非史則無事可求，一切朝章國故，天下利病，從何溯其沿革？」（《史學大綱》自序）「事」是立論的基礎，章學誠所謂「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但讀史又須考其時勢，「既就當日之時勢而斷其是非，更宜就今日之時勢而觀察其孰是孰非。」（《史學大綱》自序）不過他的《讀史識略》還祇對所記之事有所褒貶，資治垂訓，與傳統史學無大差異。

《史學大綱》則迥然不同，它把通史與專史結合起來，不僅內容豐富，方法新穎，而且觀點明確，結論效實。此書除介紹史學源流及史籍外，更分別就史之地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外交學、教育學、經濟學、財政學、農學、工商學、經學、理學、文學作分析研究，各種

文化現象幾乎無所不包，從中總結經驗教訓，供治國者參考。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說：「能治其國則強，不能治其國則弱。」而治國者決不能「違世界之大勢，不就病之所在而藥之，區區執古方以求療，則醫失其道，其何能瘳。」

例如，他在第七講在追溯自古至清的外交關係史之後，提出十項原則，其中第六項謂「主權不完整，無外交可言」，並警告人們說：「自恃其大而驕，其外交必敗；自慮其弱而處處退讓，其外交必敗。」他對政治、社會、教育等方面也有類似的總結，因篇幅所限不能全引，但全書的結論則不可不鄭重地點出來：「我知三百年後之中國，必有超出環球者。」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中國的未來信心百倍。

四、教育

父親自稱「余書生也」（《樂天錄》）。書生沒有不重視教育的：「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這是儒家的傳統。宋明大儒無不是大教育家。一九〇五年父親就參與廢書院、興學堂的活動。一九一一年寧波效實中學創立時，就是請父親命名的，取《天演論》中「物競天擇，效實儲能」之語。但父親與光華大學的關係卻是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慘案使父親認清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性、殘暴性；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和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使他加深了對帝國主義的仇恨。他經常

對我們說：「西山老虎要拖人（寧波方言指野獸咬死人），東山老虎也要拖人。」因此當一九二五年王省三（豐鎬）先生提出中國自辦學校目的是要從外國人手中收回教育權時，父親就雙手贊成，認為這是一樁義舉，「此又當時一念喻義所發生者也」（《六十年之回憶》）。

這部分所選的大多是父親一九二五——一九四五二十年中爲光華歷屆年刊所寫的序言，反映了父親與光華大學及其大中學師生感情之篤，期望之切。他爲教務員胡其炳先生撰寫的哀辭，贊揚他忠於職責，執法嚴格，哀嘆失此誠篤君子「如失左右手」，讀來令人酸楚落淚。

父親十分重視學生之心理建設，即今所謂精神文明。他說：「夫物質之建設難而實易，而精神之貫徹易而實難。」他希望「臻斯校於盡善盡美，永久而不敝，使國人皆曰：深沉純摯之愛國觀念，由光華啓之。」（《光華五周年紀念書序》）同時他也看到未來國際科學競爭之烈：「世界皆以學戰，而我無其具，遑論戰？」因此必須全面加强專業教學：「知工商之足以救國，則必無忽理化；知教育之所以濟世，則必普及於社會；知勞動資本之調整，則銀行必審其運用；知生產消費之支配，則經濟必探其本源。」（《光華己卯年刊序》）他特別強調畢業生必須與社會需要「合轍」。他認爲國家治亂之關鍵不在政治，

而在教育。他對東漢太學生、宋代諸生、明代東林黨的氣節之士，贊揚備至，但他又說，「學校不可不有正氣，而不可有意氣」（《史學大綱》）。總之，教育是興國之本的思想在父親是根深蒂固的。

五、財經

父親任財政官職多年，經驗豐富，也有著述。不過他不喜歡人家評論他「善於理財」。他說，平生不願談政治，但願談經濟。本書選其《理財牘稿》五篇，特別是第五篇提出考察湖北土宜，振興實業辦法，主張頗多新意。他反對榨取民脂民膏，苛捐雜稅，主張藏富於民。「治國平天下在修明內政，內政重在民生，財政則視國民之負擔力。欲負擔力之充裕，則在國民富足」（《六十年之回憶》）。這是至理名言，顛撲不破的。

從實際經驗中，父親又總結出治理財經若干基本原理，至今恐怕尚有參考價值。本書選了兩段短文，一談經濟，一談財政。對未來的經濟趨勢，他提出積極方面六條，如第一條為「本完全獨立國家精神而與世界合作定為經濟政策」；在消極方面，他提出四條：「不平等條約必須廢除」；「不道德商業行為應以商法限制之」；「凡種種不便於農工商如苛細雜捐及阻礙交通與妨礙經濟之政令一概取消」。「最大政策在順國情，不擾民，而以聚人才、保廉潔為不易方針」（《史學大綱》）。

對財政方面，他首先提出財政必須以經濟爲前提，有經濟乃有財政。他看到「我國地廣人衆，各種原料應有盡有，所缺乏者科學耳、機器耳。我人之智能不讓於他國，因此，在下宜爲上設想如何可以富國，不可僅求富家；在上宜一心爲社會，使爲一安居樂業之社會，本民有、民治、民享之精神，一一以扶植爲主。」他主張大力推行所得稅。要實行「吏厚其祿，貪污者死」（同上）。

六、詩

詩爲心聲，見仁見智，無庸解說。父親的詩以敘事論世、懷念友好爲多，即景生情、感人至深。已發表的詩篇除少數酬應作品外，這裏幾乎全部收入。

《和陶吟》與《風雨吟》實爲自傳性質，追憶家庭與個人經歷，孝悌之心，悲歡之情，溢於言表。詩中對友好、對青年、對國事、對光華，思念、鼓勵、憂慮、期望之殷切，坦露如鏡；雖處逆境，亦能哀而不傷，對艱苦奮鬥的人慰勉有加。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上海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因支持學生愛國運動遭暗殺，父親作詩哭之：

「一腔熱血灑青年，省識金剛百煉堅，……
積薪久效長沙哭，大海總教精衛填。……」

（《約園雜著續編》卷七）